

## 一位晚辈后学眼里的程毅中先生

□ 刘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

深耕古籍整理、沉潜古代小说研究的著名学者程毅中先生离开了我们，亲炙于学术名家、亲眼目睹过学术泰斗风采的老一辈学者越来越少了，不止是学术界的损失，也是学术史的损失！

3月22日下午五点，我把刚写好的《云烟过眼续录：孤本珍籍书志稿三篇》准备发给程有庆老师，觉得有一段时间没和程老师联系了，借小作为由头了解一下程老师的近况，当然也期待听到他的哪怕是片言只语的指导意见。发小作之前，先转发给程老师一篇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公号发的程毅中先生所撰《“笨工夫”才是真功夫》的推介文章，并留了一段话“喜欢读程老的文章和文字风格，每次读到，都让我觉得古典学问很大，要谦虚踏实”。但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程毅中先生去世的消息，因为一整天都在集中精力写这篇稿子，手机基本没怎么看，偶尔翻看到这篇推介文章（未呈现灰色，也没想到其它的），所以接着又把写好的稿子发给程老师。然后我拿起手机翻看微信里的公众号，突然看到数条关于程毅中先生去世的消息，顿时觉得很沉重，也深感自己很不懂事。怎么偏偏这个时候还去打扰程老师，但我确实事先不知道，所以赶紧又给程老师发微信做解释，请他节哀。程老师回了一个字“谢”，后面跟着一个“！”。我随即联系李坚，请她告我时间，相约和善本组几位老同事一起到八宝山送别程毅中先生。

26日九点一刻左右抵达八宝山，见到了李坚、际宁老师和向辉兄等几位老同事，还有中华书局的兆虎兄等。兆虎兄问我怎么也来了？是啊，程毅中先生和晚辈我隔着数辈，坦白地讲，晚辈也和程毅中先生没有交往，但读过程老的文章，也在很多别人的文章里看到过关于程老的文字。程老作为邀请专家去国图参加会议，也见过数次，现场聆听发言。当然最重要的是有缘和程老哲嗣程有庆老师一起工作十余年，偶尔听到程老师讲上几句有关程老的话。2019年5月我调入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还是从事图书馆古籍方面的老本行，所以也和程老师有联系，只是不多，没有要紧事，我也轻易不打扰。这些细节拼接起来，自然形成一位晚辈后学印象里的程老，实际像我这种情形的，应该很多，因为程老是名家，不知在潜移默化层面影响了多少青年学人。但要说是像我这样，能够直接从程老师那里听到程老的，恐怕也不见得有多，这姑且也算一层机缘吧！

我从一个小地方考到北京来，没有见过多少世面，学界的听闻自然也极为有限。在清华中文系读研究生期间，刘石老师出版了他的《有高楼杂稿》，惠赐一册，在该书的《后记》里第一次知道程毅中先生之名。大意是刘石老师说他在中华书局工作乔迁新居，正是程毅中先生所住旧居，程老名为“有高楼”，取“西北有高楼”之意，刘老师又以之作为著述之名。大概是2014年4月份，刘老师为整理《法书要录》到文津街馆区查阅该书的古籍版本，中午饭点我陪刘老师一起吃饭，然后散步聊天。一日，散步时遇到程有庆老师，我向刘老师做

介绍，寒暄之后，刘老师说程老师还是很有几分像程老的，同时说起了程老，说程老在中华书局，大家都对他没有意见，做人做到这样很不容易。我想刘石老师只是客观评价，他不夹杂个人情感亲疏，所以没有事先征得刘老师的同意，写在这里，想必刘老师也不会怪罪我。

研究生读书期间，我很关注、喜欢《文选》这部典籍，特别是版本方面的问题，为此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古籍阅览室查阅了馆藏的所有版本。但隔靴搔痒，其于大达亦远，还得看看学术名家是如何进行《文选》版本研究的，我读到了程老和白化文先生合撰的《略谈李善注〈文选〉的尤刻本》，很受教益和启发。写到这里，白化文先生也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大概是2007年下半年，善本部安排我和司机一起去北大接白先生到馆里开会，事先约定在北大西门见面。结果我进来西门，怎么也看不见白先生，开会时间又很快就到了，很着急地四处找。猛一回头，白先生正在一池塘边看水中优游的鱼儿，一副悠闲自得的名士范。程有庆老师说程老和白先生风格不同，白先生是文人气质多一些，程老则是一名纯粹的学者。这篇文章，据专家讲是70年代末以来《文选》版本研究的第一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接推动了《文选》版本的话题进入学界视野。现在推想起来，文章撰写的缘起可能与程老更密切一些，因为中华书局在1974年影印了南宋尤袤刻本《文选》，还是采用的函套线装的形式，应该正是该工作促成此篇文章的写作。说来也巧，拜读徐俊先生撰写的怀念程老的文章《雨丝风片座中春——程毅中先生晚年琐记》，里面提到程老写给徐俊先生的一封邮件，有请徐俊先生协调核对《文选》项目旧档的要求。这里的《文选》项目，或许指的就是70年代影印的尤刻本，为何核对，有何考虑，我就知道了。

自我2007年研究生毕业开始到国图善本组工作，在接下来的十一年里，还是有好几次听到程老师提及程老，但说的都很平静质朴。

程老师继承家学，也关注小说，有一次提起《文学遗产》编辑部请程老审一篇五鼠闹东京小说的稿件。我也好奇，后来看到这篇稿子刊发出来，作者就是北大中文系的潘建国老师。程老师也偶尔讲起往事，说他小时候调皮，把浦江清先生赠给程老的印章搞丢了，结果被程老一番“教训”，说浦江清是程老的老师，把老师的印章弄丢了，程老自然着急又生气。浦江清我在清华读研究生期间听老师们讲过，最有名的一篇论文是《八仙考》，原来程老是浦江清的弟子。程老师还告诉我浦江清去世后，程老又跟着吴组缃继续学习，两位都是院系调整时从清华调到北大的老师。程老是很感念老师浦江清的，听到有这样一种说法，当年程老从西安再考北大中文系的副博士研究生，浦江清讲程毅中就不用考试了直接来读就好了。从程老师的口中所讲，也完全体会得到这一点，说有一年程老祝寿，浦江清的女儿浦汉明先生也参加，合影时程老让浦汉明先生坐第一排，说老师的女儿坐第一排。座次不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的“次”，它的背后是对老师培养之恩的永远的敬重。

大约是2012年间，在文津街馆区办公室上班的某一日，办公室进来了一位面容和蔼、很有学者风度的中年女性，直接找程老师，我不知道是谁。后来听程老师介绍，她是戴燕老师，曾经在中华书局工作，后来调到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最后又到复旦大学工作。程老师讲，有一年优秀论文评奖，程老很称赞戴燕老师的论文，说会得奖，果不其然。我在国图工作期间，曾参与馆藏善本书志撰写的工作任务，善本组请程老师担任指导。书志稿有拟定的撰写体例，但每个人写起来难免有发挥的地方，程老师就讲程老在中华书局的例子，指导年轻的编辑刚开始写东西时宜收宜紧，待有积累后再有所发挥。也想起2014年秋季在清华在职读

博，选修张海明老师的课，讲古小说《燕丹子》的作者问题，通过文本细读和分析，认为《燕丹子》的作者是南朝人江淹，论文已经发表。张老师讲，有一次开会见到程毅中先生，他就把这个看法相告，并请程毅中先生指导批评。程毅中先生当即说，请将论文发给他看看。记得刘石老师也讲，他注意到《史记》里一处记载的矛盾抵牾，就去请教程毅中先生，指导刘老师看梁玉绳的《史记志疑》，果然《志疑》里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与程老没有交往，只能从这些听闻来的琐碎的间接的细节里，呈现程老对待学界后学（相较于程老的辈分）的态度，那就是耐心的指导、提携，还有呵护。

当然，人都免不了世俗的“烦扰”，程老也不例外，程老师也偶有提及，只是有些听不太懂，这些多与家事有关。2007年底，程有庆老师陪同杨成凯先生到苏州看古籍，是国家第一批珍贵古籍名录入选古籍的复核工作，程老师说在苏州图书馆终于看到了曾为他们家旧藏的宋版书，就是那部《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很有一番感慨。我也很喜欢宋版书，从网上看到有关这部宋版的来龙去脉，也看到了关于程老当年通过法律途径为这部宋版讨说法的过程。还有一次听程老师讲到，苏州老宅在旧城改造规划里的处置安排，说这件事也很让程老费神。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程老师带着程老写的书法作品到单位，让我们看，我说写得真好，我不懂书法，但那端正遒劲的楷书还是很让人觉得书法之美的。程老师说，这还是写得不好了呢，年龄大了，一个字里免不了有写不好的地方。程老师还提到，程老在家里还“盯着”电脑一丝不苟地整天忙着做《宣和遗事》的整理，让他很惭愧，这时候程毅中先生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

算是“近距离”地见到程老，或者现场聆听他的发言，印象比较深地有两次。一次是2016年1月参加傅璇琮先生遗体告别，当时我还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在职读博，傅先生晚年调到清华当教授，培养博士生。那天称得上是北京最冷的一天，在现场除了见到谢思炜老师等老师外，就是见到了德高望重的程老，程老恐怕是参加告别仪式的人当中最年长的一位。那一年，程老高寿八十六，但从走道来看仍很矍铄，看上去气色也很精神。程老和傅璇琮先生是同班同学，是院系调整使他们成为了同班同学，程老原是就读燕京大学，傅先生则就读清华大学，在北京大学成为同窗。后来，两位先生又成为工作同事，分别任总编辑和副总编辑，同在中华书局从事古籍整理工作至退休，留下了学界佳话。

第二次是2021年7月23日，参加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六十载使命接续 千百卷传奇完璧——《古本戏曲丛刊》编纂出版座谈会”，在国家图书馆召开，刘跃进老师主持座谈会，程老参加会议并有发言。当时程老还是给人很健康的印象，讲话的气道很洪亮，就是感觉背驼得更厉害了，毕竟是高龄九十一的老人了。程老的发言，我居然找到了原始的记录稿，是写在几张“国家图书馆”便笺纸上的，否则光凭印象难免有不周之处。程老追述了《古本戏曲丛刊》编辑的历程，我重点把笔记里记录的这几句话写在这里，程老讲要把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史料收集在一起，大概意思是给后人留下第一手古籍整理档案，以备查询，当然更重要的这是学术史的组成部分，很能看出程老的工作眼光和学术视野。前面提到，徐俊先生《雨丝风片座中春——程毅中先生晚年琐记》怀念文章里也讲到程老查询古籍整理项目旧档的事。刘跃进老师很注重这方面的资料的保存，在《古本戏曲丛刊》全十集完成之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名义出版了《箫韶九成——

《古本戏曲丛刊》编纂纪程》，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就很好地保存了自郑振铎以来编辑《古本戏曲丛刊》的历史过程，存人存事更存书，是致敬也是对后来者的激励。

程老还讲到关于古籍整理的看法，提出要认识到文献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价值，要重视它的独立价值。这一点，似乎程老讲过多次，针对的应该是学术评价体系不把古籍整理成果当作成果的情形，挫伤了古籍整理者的信心和积极性，也不利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毋庸讳言，也充斥着一些学术低劣的古籍整理伪成果，但不应一刀切，真正有良心的负责任的古籍整理成果，不仅要得到学界应有的认可，还应该给予适当的鼓励，这样才能够让这个寂寞的坐冷板凳的领域代有传承。我所了解到的，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是认可古籍整理成果的。回到当下来看，把文献学“塑造”为一门有独立价值的学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领域内同人的齐心合力。说到这里，插一件事，4月3日在中华书局参加怀念杨成凯先生的直播，见到姚伯岳老师，我和他聊起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申请开设古籍课的事，他说了一句让我很有触动的话，说不要觉得古籍大家都不感兴趣，是我们工作没做好。文献学学科的建设也是同样的道理，不要老是抱怨学科不受重视，而是我们做文献学的应该积极有为，按照文学研究所刘宁老师的说法就是努力多发声。程毅中先生的古籍整理成果，就是文献学具有独立价值的最好的佐证，也是对文献学领域后进的极大激励。

程老接着的发言再次强调研究和整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古籍出版的历史，在徐俊先生《雨丝风片座中春——程毅中先生晚年琐记》怀念文章里，也提到这一点，就是程老一直关注中华书局书稿档案的保存和管理工作。中华书局是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的核心重镇，从某种意义上讲，新中国成立以来古籍出版的历史，不就是中华书局古籍出版的历史吗？这个课题很重要，古籍的整理总要持续下去，宏观层面讲，这是文化的传承，历史的责任。微观层面讲，可能会出现新的版本材料，一代也有一代古籍整理的学术眼光和价值追求，目标也就同中有异。前人做过的古籍整理工作要想给后人留下借鉴和参考，除了古籍整理成果本身以外，这些古籍整理工作的档案资料就是最好的借鉴和参考。再说，学术史很大，做好了古籍整理出版史，也就给学术史提供了很好的注脚。

令人尊敬的程毅中先生离开了我们，哲人其萎，但所凝铸的宝贵学术精神和人格风范，精心结撰的学术著述和古籍整理成果，相信会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给后来者以文化传灯，以学术津梁。至此，作为一名后学晚辈也收起了怀念程老的笔，文中提到了诸多的人和事，还有作为长辈老师的当事人说过的话，未能一一征得他们的同意写在文中，如有不妥之处，也敬请宽容谅解。